



美学建构与 中国文化精神的 现代诠释

韩德民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美学建构与 中国文化精神的 现代诠释

韩德民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学建构与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诠释/韩德民著.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004-9702-8

I. ①美… II. ①韩… III. ①美学思想-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841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07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上篇 “体”、“用”论争与现代文化转型的策略透视

- 一 “美学”:人文科学特性对民族性的内在要求…………… (3)
- 二 “中学”“西化”:“体”、“用”论争及其实践影响…………… (18)
- 三 “文化保守主义”:渐进性改革模式的形态特征与功能效应…………… (48)
- 四 附论:为中国文化之“道”的重建而努力…………… (82)

中篇 “美学”向“中国美学”嬗变的多元尝试

- 一 王国维:借“外界之势力”“倡大吾国固有之哲学”…………… (105)
- 二 朱光潜:矛盾和紧张的理论综合者…………… (127)
- 三 蔡仪与高尔泰:物理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对立两极…………… (141)
- 四 李泽厚:从“实践”到“主体性”的迁移…………… (157)
- 五 宗白华及其之后:“意象”美学与传统范畴现代性的开发…………… (176)
- 六 中国元素的融入与美学原理教学体系的演化…………… (204)

下篇 “美育”与塑造现代国民性的努力

- 一 梁启超:“新民”与近代“美育”观念的借鉴…………… (235)
- 二 西学东渐与现代校园文化观念的生长…………… (251)

三 “主体性”思想与“君子”理想的现代性阐释·····	(271)
四 “主体性实践哲学”中的美育问题·····	(285)
五 从实践功能角度为“美育”定位·····	(309)
后记·····	(326)

上篇

“体”、“用”论争与现代文化
转型的策略透视

一 “美学”：人文科学特性对民族性的内在要求

提要：“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个性化特质决定了它内在的民族性要求。只有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绵延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文化积累，才能为个性化人格结构的丰富与完善提供充分有效的营养资源。中国现代学术的特殊发生背景，导致了“中国美学”建构原则的二重性，一方面是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层面对中国文化之“道”的承接与认同原则；另一方面是学术方法和话语方式层面对现代西方学术的引进和借鉴原则。由于中西文化力量对比的不平衡，“中国美学”对“西学”方法的借鉴和参照，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对西方话语方式的因袭和移植。这不利于中国美学的健康成长，也无助于西方美学的长足进步。中国美学建设亟待解决的核心课题，乃是把握民族化的个性特质与人文知识普遍性效用之间的内在统一，通过民族性的弘扬而非排斥探求学术现代化的可能途径。

(一)

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最突出特点，乃是它的研究不仅涉及对象性的客体事实，而且涉及研究主体对于事实的体验和评判，这就是所谓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就构成这种审美评价之出发点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而言，通过社会学层面上的调查研究，当然也可以归纳出某种普遍性的“标准”，但这种“标准”永远只能是理论上的抽象，实践中存在的只能是个性化

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卡西尔曾借布克哈特“文艺复兴人”的概念，阐述过“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概念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概念之间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假定吾人当前有一件物体，我们于发觉了这一或某一块金属具有了一切我们所知晓的作为‘金’的条件后，乃可以把这一块金属收蓄于‘金’此一概念之下；然而，在谈论到有如所谓‘文艺复兴人’时，所谓收蓄便不能以上述的方式进行了。当我们把莱奥纳尔多·达·芬奇与阿雷蒂诺，把马尔西利奥·费琴诺与马基雅维利，和把米开朗琪罗与切萨雷·博贾等人都称为‘文艺复兴人’的时候，我们当然并不意图说这些人物全都具有某一些于内容上为固定的，彼此吻合的个别特征。我们不单只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其实完全不一样，而且更感觉他们之间甚至是对立的。我们所要指出有关于他们的，不过是：无论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对立迥异，或甚至正因为这些对立，他们却共同地站立在某一特别的观念上的相关性之上；也即是说，他们之间的每一个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参与缔造上述我们一般所谓的文艺复兴的‘精神’或文艺复兴的文化。此中吾人所要表达的，乃是一方向（Richtung）上的统一性，而非一存在（Sein）上的统一性。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个别人物之所以为属于共同的一群，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同或相似，而是因为他们一同地参与了一共同的使命（Aufgabe），而此一使命乃是吾人相对于中世纪而言称之为崭新的，而且是吾人所认为是代表了文艺复兴的独特‘意义’的。在精细的分析下，人文科学的所有真正的风格概念都是可以化约于这些‘意义概念’之上的。……这一类的概念虽然有刻画出一定的特征之功能，但却并没有决定之功能：那统属于其下的特殊个例是不能自这些概念里导生出来的。”^①作为人文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概念，无论是审美趣味还是审美理想，抑或是以客体化形式呈现的审美价值，其作为美学理论建构支点的效能，只能通过与面目各异的个性化精神世界的关联才能得到有效阐释。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7页。

自然科学家也有个性，他的个性对研究工作也会发生影响，但这种个性的内涵却是外在于其研究成果的。也即，其理论学说的结论和核心阐述，其实质内容与研究者的特殊气禀无关，而仅仅关涉到对象领域的客体事实。所以，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在不同研究者那里，可以得到重复性的验证。牛顿的经典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初创阶段的表述和论证，可能都或多或少地联系着创立者的某种性格特质。但随着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和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就一步步转化成了普遍有效的公共性知识，而不再与原创者的个性气质有什么本质性的关联。美学等人文科学研究则与此不同，美学理论与研究者个性的内在性相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成果在不同研究主体间完全通约的不可能性。站在这样的角度，则“人文科学”的“人文”，就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上与人的外部性联系，而且意味着研究结果上同研究主体内禀的实质性相关。^① 所以研究几何学可以不阅读欧几里得的著作，研究经典力学可以不阅读牛顿的著作，研究相对论也可以不阅读爱因斯坦本人的著作，但研究古希腊美学却必须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著作。

人文科学研究者的个性与其研究成果之间的实质性相关，在根本上系于其特殊的研究目标。不同于自然科学之追索现象世界之所谓恒定的“本质”，人文科学关注的是其动态的内在生命意味。对于研究对象这种生命意味的体会与把握，除掉研究者基于自我生命体验之中介作用的阐释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第

^① 有些论著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划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如称：“对人的自然生命、对人与自然界的联系的研究，就形成了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应用化的结果，又延伸出技术科学；而对人的文化生命、对人与社会的联系的研究，则形成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人的文化生命的研究，与对人与社会联系的研究，是不相同的。前者所探讨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的本身，即人的本质；而后者所探讨的，则是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即人的行为。对于前者的探讨，形成了人文科学；对于后者的探讨，形成了社会科学。”（李维武：《人文科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笔者以为，首先，研究对象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脱离研究方法，不考虑研究过程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不同关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在实践中很难落实。如人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分界在哪里，情感生活与欲望冲动属于“自然生命”还是“文化生命”等问题，往往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次，单纯基于研究对象所作出的划分，往往并不能真正反映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属性。如古希腊时期的某些自然哲学著作，今天可以很自然地纳入人文科学的阅读范围，反之，某些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则很难说体现了什么“人文科学”的特性。

二种途径。不同于古希腊思想传统之更多关注自然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始基，或说恒定“本质”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关注的焦点，从一开始就同人文的意义世界有着更密切的关联。对人文意义世界的特殊关注使中国思想传统很早就对人文科学特有的阐释方法形成了某种观念的自觉。基于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这种体会，余敦康先生才反复强调，“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进路”^①。无论是孟子的“推己及人”，还是孔子的“恕”，实际上说的都是基于自我生命体验而展开的对于对象世界的意义探究。被认定为“周文王遗言”的《保训》篇的发现，甚至将这种阐释观念自觉的源头上溯到了殷商之际：“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迓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②按文王的叙述，舜置身恶劣的人际关系中，所以“恐”而“求中”，也就是希望恰当地处理好这些人际关系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研究问题，但舜的研究不同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仰望星空，而首先是内向性的“自稽厥志”，在此基础上，再“推己及人”，以自我的心性体验为中介，来达到对“上下远迩”、“阴阳之物”的理解，由此而消弭种种对立冲突，实现整个共同体的和谐安定。

对于审美意义世界的阐释来说，阐释主体的个性化生命精神，其本身就是这个意义世界的内在组成部分。对此中国传统美学有着充分的认识。如柳宗元所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柳河东集》卷二十七）本是侧重于自然界所谓恒定“本质”之探求的西方思想传统，到近现代以后也出现了转向，开始反省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认识模式之不足：“科学以纯粹的数字概念，或曰，以一些物理常数和化学常数去对事物之‘本质’作出决定，而这些物理与化学常数是独特于每一事物种类的。为了要建立一个系统网络，科学以一些固定的函数关系或一些方程式去把这些常数联结起来，这些函数关系和

^① 参阅余敦康《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进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思想史室主办《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内刊）总第5辑（2005年3月）。

^②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藏《保训》，转引自李学勤《周文王遗言》，《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

方程式让我们知道某一个数值是如何地被决定于其他数值之上。这样，我们才终于获取了‘客观’实有界巩固的架构；如是地，一单一的，共同的事物世界乃被建构出来。然而，这一项成果却必须以一种牺牲作为其代价。吾人的事物世界乃根本地被彻底地褫夺了灵魂（radikal entseelt）；大凡一切以某一方式令人联想到自我之‘位格’的生命体验的，都不单止遭到压抑，甚至遭到排斥和消解。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图像中，人类的文化是难以觅得一栖迟之所与归宿的。”^① 由此而有对意义世界的探究和以意义世界为指向的诸如“文化科学”、“精神科学”、“历史科学”、“人文科学”等观念的吁呼，并形成了某种与中国传统思想诠释方法相通的认识。^② 新黑格尔主义者克洛纳提出，“最高者是不能由共相来把握的，它不能由概念来理解”，只有“想象”才能“把能思的心灵所分离开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想象比感官或理性都更接近真实的生活”。^③ 正好像中国思想传统从一开始就将反躬自省、将心比心当做正确介入人际关系世界的有效手段一样，近代西方人文科学观念的自觉，也以对研究者心性体验在研究过程中所赋有的基础性地位的肯定为基本标志。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卡西尔说人文科学永远不可能企及自然科学所达到的那种“形式的普遍性”，并且最终也“无法否认其拟人主义和人类本位主义色彩”^④。因为研究主体之个性化心性气质对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的这种内在性介入，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文科学发展的非进化性。在这样的领域，任何有创造意义的理论，都与创立者特定的个性化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甚至直接就是这种特定个性的理论化提升。

从研究目标看，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研究，其终极指向不是职业性训练，不是培养专门性的知识或技术专家，而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促进个体成员人格结构的更全面发育。这样的教育理念，同人文科学理论价值的评判标准是相互对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 页。

② 参看本书中编第五章第四节的讨论。

③ [德] 克洛纳（R. Kroner）：《信仰的首要地位》；转引自张世英《论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13—314 页。

④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3 页。

应的。人文科学理论研究的提升促进个性精神发育的完善，而充分发展的多样化个性精神又提供了人文科学研究进步最肥沃的土壤。审美教育虽不排斥具体的比如说艺术技巧或艺术史的知识传授，却必须超越这种知识传授或技巧训练的专门范围，而将其纳入到整体性的文化修养体系之中。健康的人格，其发育是全方位的，这种人格作为主体性的精神世界，其内容也不是外在客体性规律所能够涵盖的。审美等人文教育传授专门知识的过程，不是灌输外在规范的过程，而是整合不同知识系统背后的多样化心灵力量，以拓展受教育者内在心灵境界的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并不存在‘人文’这种实体。只有把各学科视为主体性活动的不同领域，即人的存在的不同形式或载体，视为人的本质的多项规定域，才能获得人文学科概念。……以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为对象的数学只是科学，而把研究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作为人的一种自我实现活动时，数学就成为人文学科。”^① 在与主体性的内在相关中，美学等人文科学才能提供区别于客体性真理的意义目标和价值关怀方式，对作为目的主体而非工具手段存在的人格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

就研究对象看，相对于自然科学，美学作为人文科学更执著于对象特有的不可重复的一次性生命意蕴。W. 狄尔泰及新康德主义者 H. 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人，都曾十分突出地强调了人文科学的这种特征。卡西尔说：“文德尔班把自然科学的判断称之为制定法则的，而把历史科学的判断称为描述特征的。前者给予我们普遍的法则，后者则向我们描述特殊的事实。”^② 此种认识也构成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志。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指向人，它所追求的却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体性真理，因而社会科学一方面努力超越特定主体价值立场的限制，引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各种方法，另一方面，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也力图最大限度地将其纳入客体性规律的系统，尽量减少其作为“主体”所可能表现出的各种不符合规律的特点。人文科学则积极

^① 尤西林：《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②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

肯定人的文化性生存与自然现象的本质区别，后者的活动从属于普遍的外部规律，前者作为自由自觉的目的性追求的表现，只能从其内部加以理解。

相应于“人文”的上述特性，“人文科学”的所谓“科学”，有两方面的意指。一是说，这种学科的内在个性化特质，不是私人性的、与科学追求的普遍有效性相敌对的，恰恰相反，愈是包含了独特个性化特质的理论，愈是具有普遍的人类性意义。二是说，人文科学不仅要立足于特定价值立场对有关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论证，而且还试图跳出特定价值观念的限制，对各种个性化的价值立场之形成与发展的外在社会与内在心理根源，进行社会学的归纳与心理学的阐释，在此前提下，它也可以借助某些实验与实证的手段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一个方面保证了人文科学所特有的区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殊文化功能，第二个方面则有效地避免了人文科学的所谓“人文”陷入封闭的主观性中，失去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效建构能力。

(二)

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个性化特征，不是它的弱点或“不成熟性”的表现，而是它有效承担自己社会文化功能所必须的。站在一般性人类文化的立场上，个体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这种带有偶然性的个体存在形式本身，而在于任何个体的生存，都有可能从特定角度对人的文化世界，对人类文化性生存所可能赋有的内涵，作出特殊的绽出或者展开。特定个体对于文化世界的展开不可能是全面的，只有许多不同个体的存在，才有可能对文化世界的总体意义共同作出越来越充分的说明，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说，任何个体的存在都有其特殊的价值，也天然地禀有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当然，个体存在本身，并不必然地导致精神化的个性，更不必然导致具有独创意义的系统性的理论自觉。^① 社会

^① 在[瑞士]雅克布·布克哈特看来，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才出现了他所谓“个性的人”，这当然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人的个体生活。参看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二篇《个人的发展》，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实践层面的个体性生存只是提供了某种前提或说机会，由这种个体性生存过程形成特定的个性精神，进而将这种个性精神提升到理性自觉的高度，使之进入社会相互性的公共空间，成为人类文化世界的组成部分，需要个体生命的自觉努力。这种努力的必要决定了个体的在世责任，也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文科学理论的价值。个体在世的这种责任，与其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利是内在地统一的。与权利的不可被剥夺相一致，这种责任也只能由他自己承负，而不能由任何他者代替。

不同的生命，其由个体存在发展出的精神层面的个性，其在这种个性基础上形成的理性化的观念体系，在深度上是有巨大差异的。那些由于各种条件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个性，它对世界的把握与说明，不仅是独特的，而且在其与文化世界整体具有充分相通性的意义上，也是特别富于深度的。与人类已有的文化遗产相比，它提供了新的启示。这样的个性，就不仅是物态实践层面的唯一，而且是精神创化层面的独造。这样的个性精神及相应的观念性表述，就有使人类文化变得更丰富更有深度的作用，因而其意义就是普遍的乃至永恒的。另外一些个体，作为自然生命固然也是唯一的，却没有对自己的唯一性形成充分的观念自觉，没有建立起真正个性化的精神宇宙，没有对文化的可能性提供新的展开。就是从这种个性独创性出发，才有了判断人文科学价值高低的根本依据。孔孟荀在社会政治观念上各有侧重，但在为学方向上却一脉相承，同样推崇“为己”之学。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言说者的个性化精神世界，是任何理论建构的根。用陆象山的话说，叫做吾今只堂堂正正地做个人，因为和作为人的自我主体性相比，任何外在的功业名声乃至学问，都是第二位的。傅雷非常重视儿子傅聪的学业进步，为此不惜高价请来各学科的专门老师，但他仍然坚持“教育当以人格为主，知识其次。孩子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学问欠缺一些没有关系”^①。总之，自我个性化人格的建构是人生在世最根本的任务，也是人文科学理论的真正生命力所在。

^① 《致成家榴》（1965年9月8日）；《傅雷文集》（书信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735页。

人文科学的个性与普遍性是统一的，愈是充分个性化的学说，愈是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意义，而且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学说，其内涵特性也愈是唯一的，是充满个性特质因而不能被其他学说代替包容的。所以在人文科学领域，缺乏个性独创性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人文科学研究的这种个性化特质，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进一步体现为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民族性、时代性、阶级性等，而其中尤以民族性问题更具重要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迄今为止，民族共同体仍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基本依托，由以形成的民族性文化传统也是个性精神成长发育的最可靠保障。傅雷说：“民族观念是立身处世的根本，只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才是真有骨气的人，而不是狭隘的国家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会变做盲目崇外主义者。只有真正懂得，而且能欣赏、热爱本国传统的道德、人生观、文化、艺术的特点，才能真正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而弃其糟粕。”^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傅雷在培养儿子傅聪成为优秀钢琴艺术演奏家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引导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吸收。没有独立而深邃的个性生命，钢琴演奏家不可能对所演奏的作品作出自己的创造性阐释，而离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滋养，个性生命世界的发育成长过程无疑将成为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任何伟大的精神个性的孕育，其背后都必然联系着某种深厚的精神文化传统，而所有这些深厚的人类精神文化传统，都是以民族文化传统的方式绵延伸展的。美学等人文学科研究成果与研究主体个性的内在性相关，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民族化特征。

自然科学就其文化属性而言，也有某种民族化的特征。J. R. 拉维茨说：“科学知识是由一种复杂的社会努力完成的，导源于处于同自然界十分特殊的相互作用中的许多工匠的工作。”^② 科学既是社会性活动的结晶，它就必然与特定社会文化传统存在关联。这既表现在具体科学理论的产生过程上，也表现在其知识呈现与运用的具体形态和方式上。“比如说当代的动物学和植物学的

^① 《致成家楮》（1965年9月8日）；《傅雷文集》（书信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735页。

^② 转引自[英] A. F.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3页。

分类系统，已经被全世界众多的民族所接受，这样的系统概括性很大，因而它可以把已经发现的动物和植物都纳入其中，与此同时，它就必然忽视同一物种内客观存在的细微差别，它就必须人为地划定一个非常宽的差异弧度，以适应这种能够普遍推广的分类系统的需要。于是在人们当今可以查到的普同性生物分类学专著中，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无法查到在物种之下的差别和变异。……但是这些被当代科学所忽视的物种中，在处于非工业阶段文化的民族的科学知识体系，却有令人惊讶的细微记载。比如有些狩猎——采集民族，对于野生动植物在不同的采集时间，其可适性和口味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以什么样的生物表征为转移等等，这样的知识在任何现代科学知识中都是不可能有的。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知识对于处于这种状况下的民族和个人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和必需的。而且同样是经过艰辛的探索活动，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代价而获得的可贵知识。它同样应该归入科学的范畴……人类在科学的道路上，永远处于一种不得兼顾的为难境地，要提高它的可推广性，就必然牺牲它的专用性和精微性。要求它越是精微，越是效率高，那么它在跨民族的推广中又会受到伤害，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永远不能两全其美。因而……普同性的科学一置入具体的民族中，就得经过各民族的创造性劳动，使之专用化、精细化、具体化。否则，不能发挥效益。”^① 但尽管如此，在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联方式上，人文科学仍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的普遍性意义与其民族化特性是负相关的，而人文科学的普遍性意义却恰恰以其民族性内涵为前提。越是有民族性特征，就越具有世界性意义，这种对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理解，仅仅在艺术和人文科学领域才是有效的，因为这些领域里所谓的普遍性观念所联系着的，用卡西尔的术语说，只是“方向（Richtung）”上而非“存在（Sein）”上的“统一性”。这种“方向”上的“统一性”并不规定或包含统属其下的种种特例，其作为“统一性”的内涵本身恰恰有待种种不同面目之特例的分别阐释。至于自然科学，虽然客观上任何以普同性面目出现的科学

^①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